

## 江淹《恨赋》别解

张海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关键词 江淹《恨赋》;建平王《芜城赋》

摘要 江淹《恨赋》为何而作,作于何时,长期以来一直是江淹研究中的一大难题。结合江淹他作及其仕宦经历来看,《恨赋》之作当与建平王景素被杀有直接的关系。赋中秦帝、赵王等六人均有所指代,江淹实非代古人申恨,而是借写古人之恨来表达自己不便明言的现实感受,正是这一动机决定了《恨赋》在用语及写作手法方面的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4)-033-07

Another View to Jiang Yan' *On Regret*

ZHANG Hai-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Key words: Jiang Yan; *On Regret*; King Jianping; *On Deserted Town*

Abstract: When and why Jiang Yan wrote *On Regret* has long been a major problem in the research. Considering the official career and other works of Jiang Ya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On Regret* should have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ath of King Jianping Liu Jingsu. Six characters in this work, including Emperor Qin and King Zhao, all have their own references. In this concealed way, Jiang Yan was actually expressing some realistic feelings by using the past, not merely voicing hatred in place of ancients. This motivation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rding and writing method of *On Regret*.

—

《恨赋》为江淹的代表作之一,与《别赋》并称,然其意蕴历来难解。明人叶良佩《吊古赋序》便说:“尝读江文通《恨赋》,而莫喻其意。夫文通之恨,渺矣!奚以赋为?乃予读之则戚戚然,若有创于其心者。”<sup>〔1〕</sup>(P147)叶良佩坦陈,虽然读后若有所感,但的确不理解江淹为何写作《恨赋》,以及《恨赋》的底蕴究竟为何。

清人陶元藻则是以质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困惑。其《书江淹〈恨赋〉后》认为《恨赋》“全篇皆病”,“不如《别赋》远甚”,而归因于江淹选择失当:“其当选而不选者,如勾践忘文种之功,夫差拒伍胥之谏,荆轲不逞志于秦王,范增竟见疑于项羽,此皆恨之大者,概置勿论”;“不当选而选者,如秦帝、赵王、冯衍、嵇康:“秦王无道,固宜早亡,毕命沙丘,人心所大快者,何恨之有?若赵王受虏、敬通见黜、中散被诛,自周秦两汉以迄于齐,类此者不胜枚举焉”。此外,《恨赋》所写李陵、昭君事过于粗略,未能准确揭示出二人恨之所在,亦为陶元藻所诟病。<sup>〔2〕</sup>(P562)陶元藻的批评并非无据,但江淹为何会作如此选择,陶元藻显然无法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陶元藻与叶良佩其实不乏相似,即都意识到

《恨赋》有其费解、难解之处,只是各自的表述不同而已。

也有认为《恨赋》并不难解的,比如最早给《恨赋》作注的唐人李善。依李善所作解题,江淹之作《恨赋》,乃是抒发对“古人不称其情,皆饮恨而死”的感慨。<sup>〔3〕</sup>(P744)不过李善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江淹真是借《恨赋》代古人申恨,那么他以汉朝苏武、娄敬二人事典注“迁客海上,流戍陇阴”两句便于理不通,盖苏、娄二人皆非“伏恨而死”者,与李陵、昭君等抱憾终身的情况迥然有别,江淹为何要将其写入《恨赋》?再如以编辑《六朝文絮》见知于世的清人许梿,所作《恨赋》眉批将其内容归纳为“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贫困之恨、荣华之恨”,<sup>〔4〕</sup>(P35-37)看似简洁明了,清晰易解,其实多有疏漏,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譬如《恨赋》所述古人之恨,究竟是八事还是六事?所谓“贫困之恨、荣华之恨”是否可与秦帝、赵王等六人之恨并列?又清人孙梅评《恨赋》云:“古来言恨,不止数人,特求极著者言之耳。秦帝、赵王,一兴朝之天子,一失意之诸侯;李陵、明妃,一名将生降,一美人远嫁;敬通、中散,一抱用世之才,一具遗荣之志。六事两两相比,不犯重复,故见作法,岂止以铺叙见长者。列古事又泛叙一段,赅括其余,一当困扼之涂,一在亨通之地。要归一死,何恨如之。”<sup>〔5〕</sup>(P61)所说虽较许梿批语圆通,但若作为江淹选择

[收稿日期] 2014-05-15

[作者简介] 张海明(1957-),男,云南昆明人,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秦帝等人的理由,仍不足以服人。

以上各家所论除叶良佩外,似乎都相信江淹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不及江淹自身的现实感受。至今人读《恨赋》始关注其与江淹所处时代、社会及生平经历之关系。如钱钟书《管锥编》论《恨赋》即引陶元藻文,谓“评甚中肯”,同时指出:“惟‘宜吉反殃’云云,是仅许旁观代恨,而不尽许当局自恨也,全背淹谋篇所谓‘伏恨’、‘饮恨’之意”。〔6〕(P1413)与前人相比,钱先生不仅注意到江淹在《恨赋》中自称“仆本恨人”,更看出江淹其他作品“亦多恨人之怨嗟”,如《别赋》、《泣赋》、《去故乡赋》、《倡妇自悲赋》、《哀千里赋》等,均与《恨赋》存在某种关联。正是有见于此,钱先生明确肯定了江淹之作《恨赋》并非仅代古人申恨,作者自己的人生失意之感才是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6〕(P1411)钱先生此说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江淹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钱钟书上述观点的启发,学界普遍认为,既然《恨赋》与江淹《别赋》等作品关系密切,那么这些作品理应作于同一时期,结合江淹经历来看,被黜吴兴时写作的可能性最大。不过,江淹究竟为何而恨,《恨赋》具体因何而作,钱先生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由于对江淹生平事迹缺乏深入的了解,故即便肯定《恨赋》为江淹有感于现实之作,仍不免于曲为之解乃至郢书燕说。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期间曾担任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的朱永嘉,近年在其博文中披露了毛泽东晚年读《恨赋》的一段故实,称毛泽东不赞成将“武力未毕”解释为“指秦始皇尚未完成驱逐匈奴等事业”,认为原文有误并作批示:“‘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存有误字。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完了,怎么又说‘武力未毕’呢?”朱文还提到“宫车晚出”一句的注释,认为本当注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崩于沙丘,丞相李斯等为立胡亥秘不发丧事,但鉴于当时特殊情况不便直言,于是注为“借以指皇帝死亡”。①之所以引述这段故实,不仅因为这是曲解之一例,还在于由此可以看出导致今人曲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中,秦始皇作为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种理解的前视野决定了当时读者普遍相信《恨赋》中的秦帝是江淹代为申恨,甚至是称颂赞誉的对象。发表于1979年的《读江淹〈别赋〉〈恨赋〉》一文即延续了这一认识,文章称江淹“高度评价了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希望有秦始皇那样怀有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但又不耽于佚乐的人物来完成国家的统一”。《恨赋》的积极社会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各种典型的艺术形象引起人们对当时分裂和战乱局面及其造成的尖锐矛盾的深思,从心灵深处唤起人们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渴望”。〔7〕(P131-132)如此解读,《恨赋》的思想意义是提高了,但江淹写作《恨赋》的真实动机也随之被遮蔽了。

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恨赋》的解读仍止于表层,基本上还是沿袭清人的观点,至多是在写作时间及与江淹贬谪经历之关系方面稍有推进,然悬而未决、疑似之间的问题不减反增。比如说,我们相信仕途失意、亲友亡故是江淹写作《恨赋》的主要诱因,却无法解释赋中为何完全不用先前相关悼亡事典,更无法回答陶元藻对江淹如此选择的质疑。又比如说,我们相信《恨赋》与《别赋》等同作于江淹被

黜吴兴时期,且《恨赋》先作,《别赋》后出,但对于二赋具体的写作时间却难以考定,也难以厘清《恨赋》与江淹其他相关作品之间的联系。此外,诸如“武力未毕”、“宫车晚出”之类文字究竟应当作何解释,以及所谓类型化写作是否可以视为《恨赋》之艺术特色,都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讨。而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还是江淹写作《恨赋》的动机,亦即叶良佩所问:“奚以赋为?”

## 二

其实,关于《恨赋》之写作动机,江淹一开始就作了交代: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②

可惜历来读者大多只关注后两句,而忽略了前五句,尤其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两句所传达的愤激之情。很显然,江淹之所以会联想到那些“伏恨而死”的古人,起因乃在眼前所见荒原上散落的骨骼,拱木下掩埋的死者。那么,这里说的“蔓草萦骨,拱木敛魂”,是泛写,抑或实有所指?按照时下流行的解释,江淹之作《恨赋》,是因为遭受到挚友、爱子、妻子相继亡故的打击,再加上身处贬谪之地所萌生的悲感不平之感。这当然不失为一说,但问题在于,从江淹《伤友人赋》、《伤爱子赋》、《悼室人十首》等作品来看,虽然颇多痛惜、悲伤之情,但并没有《恨赋》那种溢于言表的愤激(《伤友人赋》所言“何人遥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存”两句,与《恨赋》之“人生到此,天道宁论”颇为相似,然语气远较《恨赋》平和)。最主要的是,如果江淹之恨仅限于此,那么当他“直念古者”时,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诸如“范式哭友”、“夷甫伤子”或“奉倩悼妇”之类故实,而不该是秦帝、赵王这些所谓“兴朝天子”、“失意诸侯”。

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有一段议论: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8〕(P2124-2125)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出自《老子·七十九章》,本以谓天道无所偏私,唯合道者与之。司马迁所说“善人”实非老子本义,他之质疑天道,是有见于善无善报,恶无恶报的现实,借伯夷、盗跖之事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江淹《伤友人赋》之“天道匪存”,《恨赋》之“天道宁论”,应该就是有取于此。只是前者意思较为显豁,因友人袁炳之早亡,好人不得善终而疑天道之不存;后者则较为含混,其所指涉是否兼有司马迁所说双重含义,单凭《恨赋》开头一段尚难判定。

我们再看接下来写秦帝之恨一段:

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鼉鼉

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断,宫车晚出。

此段可以讨论者,除上文提到的“武力未毕”、“宫车晚出”外,还有“秦帝按剑”四字。据李善注,“秦帝按剑”语本《说苑》,而《说苑·正谏》篇记:长信侯嫪毐与太后私通,恃宠而骄,始皇乃诛杀嫪毐并其与太后所生二子,迁太后于雍,大臣以太后事劝谏者亦诛杀之。齐人茅焦冒死求见秦始皇,召之入,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茅焦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不?”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等?愿闻之。”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萑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乃解衣伏质。<sup>[9](P216)</sup>

虽然秦始皇最终接受了茅焦的意见并尊之为上卿,但此处“按剑而坐,口正沫出”秦帝显然不是作者称誉的对象,更何况下文茅焦直接称其有狂悖之行、嫉妒之心、不慈之名、不孝之行、桀纣之治。那么,江淹如此描述秦帝形象,是无意抑或有心?

“武力未毕”、“宫车晚出”的情况与此相似。“华山为城,紫渊为池”两句,李善注引贾谊《过秦论》:“践华为城,因河为池。”而《过秦论》后文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sup>[8](P283)</sup>若从贾谊所论,则“武力未毕”便可解释为指秦始皇只会凭借武力暴虐天下,却不能行仁义之道以治国安邦。循此思路,所谓“方架鼉鼉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亦可理解为是借周穆王之事暗喻秦始皇开疆拓土,征伐无已。相应地,“宫车晚出”一语也并非如旧注所言仅指皇帝驾崩(此解实与“一旦魂断”同义,有叠床架屋之嫌)而毋宁说语涉双关,既可以理解为是替秦帝抱憾——纵然如秦帝权倾天下,显赫一时,到头来终不免一死,也可以理解为语含讥刺——正因为秦始皇如此行事,故当其毕命沙丘,便被藏尸凉车,腐臭而不得安葬。在此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江淹对秦始皇的描述似乎有意含糊其辞,以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效果,无怪后人读之会生歧解,甚至疑其误字。

上文曾指出对秦始皇的正面评价构成了今人解读《恨赋》的前视野,古人虽未必认同秦始皇之作为,但至少他们相信江淹是代包括秦始皇在内的古人申恨。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注解都是以此为前提的,但我们果真能够确认,江淹本人对秦始皇就一定是持肯定态度么?如果实际的情况与之相反,我们又该作何解读?

写赵王之恨一段同样令人费解。即便如许梈所说作为“列侯之恨”的代表,可选之人固多,为何偏偏是赵王?李善注“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两句道:“《淮南子》曰:赵王迁流房陵,思故乡作山木之呕,闻者莫不陨涕。高诱曰:赵王,张敖。秦灭赵,虜王,迁徙房陵。房陵在汉中。山木之呕,歌曲也。”<sup>[3](P745)</sup>《淮南子·秦族训》所说“赵王”即赵国末代

国君幽缪王赵迁,秦王政十九年(前228),赵国为秦兵所破,赵王被掳。《史记·赵世家》略记其事,而司马迁篇末赞论转述冯王孙语:“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sup>[8](P1833)</sup>据此,历史上的赵王迁并不是一个值得后人同情的对象,恰如陶元藻说“秦王无道,固宜早亡”一样,赵王迁一庸碌之辈,其亡国被掳势在必然,实在没有理由为之抱憾。至于高诱注称赵王为张敖,当属误记。张敖为汉初名臣张耳之子,嗣位为赵王,高注既言“秦灭赵,虜王”,则其非张敖可知。不过《恨赋》所写赵王是否肯定与张敖无关,尚需存疑。据《史记·张耳陈馥列传》,张敖尚高祖长女鲁元公主,高祖尝过赵,张敖执子婿礼待之甚恭,而高祖对之则颇为倨傲,由此引发张敖家臣贯高等人不满,意欲行刺高祖。事发,张敖被捕,贯高等人随之前往京城,力辩张敖实不知情,高祖乃赦张敖,而贯高自杀以谢罪。检《江淹集》可知,江淹对《淮南子》、《史记》颇为熟悉,故上述相关记载,江淹必曾见之。那么,江淹何不扣紧《淮南子》所记写赵王故国之思以展示其恨?“薄暮心动”云云,原属想象之语,而谓其“千秋万岁,为怨难胜”,实在过于勉强。《恨赋》如此行文,其真实意图究竟为何?

总之,通过对《恨赋》写秦帝、赵王两段的细读,尤其是通过对其典源的考索,可以看出江淹笔下之字面意义与其实际指向存在着某种背离关系,每当我们据其用典试图有所寻绎时,却发现被导向某个并非预期的所在,仿佛话里有话,弦外遗音。联系《恨赋》篇末所云:“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或许,江淹写作《恨赋》另有隐情,他说出的其实并不是他真正要说的。

### 三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江淹欲言又止,悲愤不已却又只能忍气吞声呢?结合江淹被黜后所作文赋及相关史传记载来看,最合乎情理的解释,莫过于建平王刘景素之死。

我们知道,刘宋元徽二年(474)夏秋之际,江淹因劝谏建平王被黜为吴兴令,先后写有《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泣赋》、《倡妇自悲赋》、《去故乡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文赋,其中除了自责之外,更多的是表达对建平王的眷念及思归之情。尤可注意者,是此时的江淹每每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逐臣屈原自况,这无疑表明江淹并未因被黜而自远建平王,他对建平王仍存有希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江淹的意料,元徽四年七月,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的景素误信京城已乱的情报,仓促起兵,而京城方面早有准备,遂大举兴兵征讨。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再加上景素本无统军之才,手下将领又各怀异心,故前后不到十日便兵败被杀,年仅二十五岁。此事《宋书·文九王传》记叙甚详,并提到景素被杀后,“即葬京口”。是年岁末,指挥平定景素之乱的齐王萧道成将江淹自吴兴召回。次年春,江淹回到京口,“守志闲居,不交当轴之士”(江淹《自序》),至七月方入萧道成幕下任功曹参军之职。

另据笔者考证,古小说《燕丹子》实为江淹向建平王建言之作,意在劝谏景素等待观望,暂缓举事。小说中鞠武语太子丹:“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赵,并韩、

魏,虽引岁月,其事必成”及荆轲之言:“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正是江淹据于当时形势给建平王的建议。而小说中欲报仇雪耻的燕太子丹和“反戾天常,虎狼其行”的秦王,则是现实中建平王景素和后废帝刘昱的化身。<sup>③</sup>

追随多年的旧主建平王最终竟然落得如此结局,江淹心头的创痛可想而知,尤其是当他回到京口,得悉建平王起兵及被杀之始末后,再回想当初劝谏建平王之语,他该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感受!本文开头曾引叶良佩语,谓“读之则戚戚然,若有创于其心者”,实在是一语中的。而更令江淹难堪的是,萧道成的召回令将他置于了一个两难之境。一方面,能够得到萧道成的赏识为其所用,免受景素谋反事件的牵连,江淹应该心存感激,但另一方面,毕竟建平王对江淹有知遇之恩,而萧道成则是讨伐景素的主帅,客观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江淹对此又怎能轻易释怀。回到京口的江淹之所以“守志闲居”将近半年,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江淹才会既写出“窃值寰海辟,仄见圭纬昌”(《还故国》)那样称颂执政者的诗句,同时又作有《无为论》明确表示不愿出仕。

现在再来看《恨赋》,问题就比较明朗了。首先,“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三句,并非泛写,而极有可能为江淹目睹之实景。景素既葬于京口,以当时之情势,必是草草掩埋于荒郊野外,如此江淹完全有可能私下前往凭吊。京口北依长江,多有冲积平原,而吴兴属武夷山脉,地势起伏,故“试望平原”云云,或可为《恨赋》作于京口之佐证。相应地,“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八字也就可以落到实处,对比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所论,可知江淹此语实兼有双重含义,即既痛感于建平王之积仁洁行却惨遭杀戮,又愤激于凶狂失道之后废帝竟无恶报。而江淹自谓“恨人”,固然不无其丧子亡妻之痛,但真正令他“心惊不已”的还是景素之死。他恨景素不听己劝,贸然举事以致兵败被杀,更恨迫于形势不能公开为建平王鸣冤,甚至不能为之写一纸悼文。江淹只能将目光转向那些同是“伏恨而死”的古人,借替古人申恨来抒发其难言之隐并自我排遣。其次,江淹之所以首选秦帝、赵王,用意正与《燕丹子》以秦王、燕太子丹指代后废帝、建平王相同。如前所述,今人相信江淹代秦帝申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有统一中国之大功而理当予以肯定,但《燕丹子》中的秦始皇却无疑是一个负面的形象,而且我们在江淹文集中找不到任何对秦始皇持肯定态度的证据。事实上,在包括江淹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秦始皇的暴君形象已是根深蒂固,故用以指代凶狂失道之后废帝自然顺理成章。至于以赵王指代建平王,关联主要有二:一是赵王迁之亡国被掳,原因乃在听信谗言诛其良将李牧,这与建平王拒纳江淹建议具有某种可比性;二是赵王张敖之被诬谋反,其情形与建平王或不乏相似。据《宋书·文九王传》,景素被杀后,曾任建平王记室参军的王虬、主簿何昌禹上书为景素鸣冤,此事江淹亦应知晓,故赵王之入《恨赋》,几可谓不二人选。再次,《恨赋》对秦帝、赵王所作描述,适与江淹之用意相契合。诸如“秦帝按剑”、“武力未毕”、“宫车晚出”等用语,不过是江淹有意设置的一个路标,倘若读者仅驻足于此,不作深究,那么

很容易认同许梈所做概括,以为就是表现“帝王之恨”、“列侯之恨”,而如果读者按其指示继续前行,便不难发现江淹其实另有所指。又如写赵王“千秋万岁,为怨难胜”,看似说赵王怨恨无已,实际上“怨”乃“冤”之谐音,“为怨难胜”即“为冤难胜”。显然,江淹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建平王之死的异议。

如果上述解释可为一说,那么《恨赋》后半部分选择李陵等四人也就有迹可寻。对于置身于两难之境的江淹来说,此时他内心最大的纠结无疑是出外去就问题,而李陵、昭君、冯衍、嵇康四人的境况正分别代表了江淹四种可能的选择。<sup>④</sup>

一是接受萧道成的征召,这无疑会令江淹背上背主求荣的骂名,恰与李陵降北的情形相似。二是投奔北朝,远走高飞,从此不再与刘宋政权有任何牵连,这与昭君远嫁,老死塞外差可比拟。三是就此退隐山林,结庐人境,一如东汉冯衍之“闭关却扫,塞门不仕”,过一种“脱略公卿,跌宕文史”的闲居生活。四是拒绝与萧道成合作,公开为建平王鸣冤,则其结果很可能如嵇康之下狱,甚至被处死。

也正因为如此,《恨赋》对李陵等人的描写便未拘泥于史实,而有意突出了其与不同选择的关联点。前述陶元藻《书江淹〈恨赋〉后》不解江淹用心,认为《恨赋》所写李陵、昭君之事过于笼统:

李陵之恨,始在五将失道,兵尽矢穷,以致被擒异域;继在误绪为陵,戮其父母妻子,以致无路可归,不成曹沫之功,卒陷通天之罪,不能写得淋漓剖切,反使李陵不忠之由沉埋终古。明妃以毛延寿颠倒真容,遂致绝宠君王,失身塞外,痛心疾首,其恨全属于斯;今只言“陇雁少飞,代云寡色”,凡出塞者人人如此,即乌孙公主、蔡文姬,何尝不领兹凄楚?岂独明妃?(2)(P552)

如果江淹只是代古人申恨,陶元藻所评自然不差,但江淹本意实在摹其“恨人”心态,故于史实多有忽略。以李陵而论,江淹的关注点主要在其“名辱身冤”的境况,以及李陵内心的痛苦(“拔剑击柱,吊影惭魂”)和“心留雁门”、“誓还汉恩”的心愿。这正是江淹当时心态之一端。昭君出塞事亦然。《恨赋》所写:“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其实不过是江淹借昭君情事遥想自己选择投奔北朝后之心境,结局。下文写冯衍、嵇康同样如此,冯衍为何见抵,嵇康为何下狱,江淹未置一词,真正令他唏嘘不已,引为同调的是二人抱恨而终的命运。就是说,无论作何选择,归顺也罢,出走也罢,隐居也罢,抗争也罢,最后的结局并无分别,都是伏恨而死,抱憾而终。在所谓“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的叙写背后,是江淹对自己将何去何从的思考。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一段,仍是江淹自况。上文提到李善以汉朝苏武、娄敬二人事典注“迁客海上,流戍陇阴”于理不通,实际上江淹乃是借古代迁徙之人暗喻自己被黜吴兴的遭遇。而所说孤臣孽子,亦只是就江淹其时之境况而言。孤臣者,谓景素已亡,失其旧主也;孽子者,谓改投萧氏,实同庶出也。“此人但闻悲风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与其说是概述“贫困之恨”,不如说是江淹的自我写照。至于“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

歌吹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数句，实由鲍照《芜城赋》化出。对比鲍赋所写前后之广陵：“当昔全盛之时，车挂鞮，人驾肩，扈闹扑地，歌吹沸天”，而战乱之后，“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不难看出二者极为相似。是知江淹此语亦如鲍赋，旨在写代谢盛衰之变，并抒发世事沧桑之感，实非“荣华之恨”所能概括。

#### 四

由此便须论及江淹《恨赋》与鲍照《芜城赋》之关系。

就笔者所见，最早指出《恨赋》受《芜城赋》影响的，大概是曹道衡先生的《汉魏六朝辞赋》（1989）一书。曹先生注意到江淹《恨赋》、《别赋》与其《青苔赋》存在某种关联，而《青苔赋》又与《芜城赋》颇多相似，“很可能《青苔赋》之作是受了鲍照的启发，而《恨赋》、《别赋》又是发挥《青苔赋》的一些情节”。譬如“《青苔赋》中‘痛百代而恨多’亦即《芜城赋》‘天道如何，吞恨者多’及‘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的意思，而这一思想又正是《恨赋》的基调。《恨赋》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作结，亦不过发挥《芜城赋》篇末之意”。〔10〕（P168-169）此后认同者渐多，如赵乃增《总制众善博综杂变——略论江淹辞赋艺术》一文认为：“《恨赋》首尾之某些用语、意象‘纯从鲍照《芜城赋》末段化出’，‘江淹《恨赋》无疑从鲍照《芜城赋》末段‘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的赋意中获得了灵犀一点的艺术启迪”。〔11〕（P78-79）又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前言》亦称“江淹赋作更多更直接地接受了鲍照的影响，如以《恨赋》与鲍照《芜城赋》比较，不仅两赋都用了许多四字句和小部分六字句，句法都力求整齐，而且部分词句也颇相似”。〔12〕（P6）

《恨赋》与《芜城赋》之间的确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以上三家所论，似尚有可以进一步商榷者。如《青苔赋》是否在《芜城赋》与《恨赋》之间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或《恨赋》所受《芜城赋》影响乃是由于发挥《青苔赋》的结果？又如《芜城赋》对《恨赋》的影响是否仅限于某些语言、意象，只是某种“艺术启迪”？或者只是句法？事实上，如果认真比对二赋，我们会发现《芜城赋》对《恨赋》的影响远较《青苔赋》明显，且绝不限于文字层面。

首先是二赋开头与结尾的类似。鲍照《芜城赋》以“弥迤平原”四字起笔，江淹《恨赋》则以“试望平原”四字开篇，这种相似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别有用心？我们知道《芜城赋》乃吊古之作，那么《恨赋》是否同样具有某种凭吊意味？如果鲍照笔下的“平原”二字是广陵地貌的实写，那么江淹所望“平原”又在何处？又《芜城赋》以“芜城之歌”作结：“边风急兮城上寒，并径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而《恨赋》同样以歌作结：“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字数虽有多寡之别，意思、包括用语却颇为相近，如“秋风惊”之于“边风急”，“丘垄平”之于“丘陇残”，“饮恨而吞声”之于“共尽兮何言”等，其间关联一望可知。《恨赋》与《芜城赋》之首尾如此相似，原因究竟为何？

其次，《恨赋》对《芜城赋》语言的袭用不止于个别字句。赵文称《恨赋》首尾某些用语纯从《芜城赋》末段化出并不确切，《恨赋》篇首“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两句的确与《芜

城赋》末段之“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相关，但“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却非化自“埋魂幽石，委骨穷尘”。《江淹集校注·前言》论二赋词句相似，列举“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吹四起”之于“车挂鞮，人驾肩，扈闹扑地，歌吹沸天”不误，然“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之于“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并无关联，“莫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两句亦不得尽同于“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说得准确些，《恨赋》所写“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吹四起”，实对应于《芜城赋》第一段中“当昔全盛之时，车挂鞮，人驾肩，扈闹扑地，歌吹沸天”，而“莫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两句乃“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四句之略写，“烟断火绝”即“薰歇烬灭”，“闭骨泉里”即“委骨穷尘”。据此，《恨赋》对《芜城赋》的袭用与其说是文辞，不如说是文意，亦即盛衰之变，悲凉之感，而这正是《芜城赋》的题旨所在。所以，《恨赋》对《芜城赋》语言的袭用不能仅归结为江淹对前人名篇写作技巧上的借鉴，而应该另有原因。

上节提到，自吴兴返回京口后的江淹完全有可能前往景素葬身处凭吊，那么，当江淹置身于昔日的争战之地而触景生情时，他是否会联想到鲍照这篇登临广陵故城而作的《芜城赋》呢？

关于《芜城赋》之写作时间，学界看法不一，或认为作于元嘉二十八年（451）即北魏南犯之后，或认为作于大明三、四年间（459-460），竟陵王刘诞之乱平定后不久。顾农先生发表于2008年的《重读鲍照〈芜城赋〉》一文对此问题作了细密的考辨，认为综合各种资料来看，《芜城赋》应作于大明三年七月沈休之攻入广陵之后、大明五年鲍照入临海王子项幕之前。〔13〕如果顾文所言，则《恨赋》与《芜城赋》关系如此密切便非偶然。我们姑不论刘诞作乱与景素谋反二事是否具有可比性，或鲍照此赋是否意在表达某种隐衷，但鲍照对广陵兵燹之后衰败景象的描绘，质疑天道，以及“心伤已摧”、“吞恨者多”等感触，无疑会引发江淹的共鸣。京口与广陵不过一江之隔，相去不远，而征讨景素之役对京口造成的损毁，多少与当年的广陵相仿佛。〔14〕又刘诞战死，景素被杀都在七月，一葬广陵，一葬京口，时间虽然相隔了十七年，却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由此看来，《恨赋》与《芜城赋》之所以存在诸多相似，并非由于江淹贪慕鲍照好句，而更有可能是二者有着某种内在关联所致。无论是“试望平原”之于“弥迤平原”，还是“春草暮兮秋风惊”之于“边风急兮城上寒”，以至“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之于“天道如何，吞恨者多”，其间异同均可由此种关联得到合理的解释。

当江淹在元徽五年暮春凭吊建平王景素时，浮现在他脑海的除了鲍照的《芜城赋》之外，应该还有他三年前被黜吴兴时写下的《别赋》。“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江淹纵有预感，也未必料到《别赋》篇末所言，竟然一语成谶！当初离开京口时“眷然西顾”、“思心徘徊”之情状犹在眼前，而今却人鬼殊途，难怪江淹会“心惊不已”，自称“恨人”。正是这两个不同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江淹在构思《恨赋》时，自觉不自觉地《芜城赋》与《别赋》作为参照之对象，从而决定了《恨赋》与《芜》、《别》二赋多有类似。就题旨而言，《恨赋》显然与《芜城赋》更多类同，都以申恨述憾为中心。就结构而言，则《恨赋》更近于《别赋》。许棄《六

朝文絮眉批称《别赋》“立格与《恨赋》同”，这话其实说反了，不是《别赋》立格与《恨赋》同，而应该是《恨赋》立格与《别赋》同。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恨赋》、《别赋》、《芜城赋》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而其纽结点则在于江淹与建平王之隐情。所以，对于《恨赋》多袭用《芜城赋》语言这一现象，恐怕也应该提出疑问，即江淹这样做，究竟是才有未逮呢，还是有意为之？上文曾指出，诸如“秦帝按剑”、“武力未毕”、“宫车晚出”等用语，不过是江淹有意设置的一个路标，那么，《恨》、《芜》二赋首尾及部分用语的类同，是否也是有意要让读者在二者之间引发联想呢？

## 五

还可再说几句的是对《恨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一语的理解。李善注引《孟子·尽心上》：“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并据之认为：“然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3〕〔P747〕又其注《别赋》“心折骨惊”：“亦互文也。”〔3〕〔P756〕意思是当作“心惊骨折”。李善此说颇为后代注江赋者所取，甚至连钱钟书这样的大家也表示认同，〔6〕〔P1413〕然细审《恨》、《别》二赋文意，李善所云恐非正解。江淹之所以写作“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而非“孤臣坠涕，孽子危心”，其意乃在以一种非常规的表述来传达自己感受的强烈。危者，疾也，“危涕”即《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上书》所云“涕下若屑”；坠者，失也，毁也，“坠心”即《别赋》“骨肉悲而心死”之“心死”，亦《诣建平王上书》“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之意，如此方与下文“血下沾衿”、“销落湮沉”相吻合。若是解作“危心坠涕”，则不过是泛言孤臣垂泪，孽子心惧，实不足以表现江淹此时的伤痛之感。《别赋》“心折骨惊”句亦复如此。江淹本作“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所以要互文，也应该是“心折骨惊”与“意夺神骇”互文，“心”即“意”也，“骨”即“神”也，二句无非是说别怨之深，离恨之广。“折”与“摧”同义，故“心折”即“心摧”，如《哀千里赋》之“魂终朝以三夺，心一夜而九摧”；⑦“骨”非骨肉之骨，乃“心”、“神”之喻耳，如《待罪江南思北归赋》之“忧而填骨，思兮乱神”《燕丹子》之“痛入骨髓”。唐人顾况《酬本部韦左司》诗：“寸心久摧折，别离重骨惊”，正用江淹本意。必拘于骨可折而心不可折之常识，将其解作“骨折心惊”，是谓别离不但令人神伤，更能致人骨折也。

应该说，李注之失，根源乃在相信江淹此赋为代古人申恨之作，而不解孤臣孽子实江淹自况，故于《恨赋》之题旨、心绪多有隔膜。后人因之，又据此判定江淹好奇尚异，雕琢文字，⑧江淹若是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

批评者固然有无的放矢之嫌，称誉者又何独不然。如前引孙梅评语，谓《恨赋》“六事两两相比，不犯重复，故见作法，岂止以铺叙见长者”。孙梅此评的前提，是认定江淹所选乃古来言恨之“极著者”，但陶元藻的质疑已经表明这一前提本身并不可靠，所以孙梅对《恨赋》的称誉便不免于隔靴搔痒。又如许棐《六朝文絮》眉批所作概括，本承李善题解而来，亦只谓江淹代古人申恨，故虽可为一说，却流于皮相，并非知人之论。

值得注意的是，今人对《恨赋》（也包括《别赋》）的评价

与许棐之说关系颇为密切。如前引吴乾兑、刘修明《读江淹〈别赋〉〈恨赋〉》即认为：《恨赋》、《别赋》“概括和抒发由于社会矛盾引起的普遍的人类感情”并将其“上升到典型意义上来”，“是文学史上的一次突破”。〔7〕〔P132〕赵乃增《总制众善 博综杂变——略论江淹辞赋艺术》进一步指出：《恨》、《别》二赋“并非抒写一时一地特定情境下的个人自我的某种情感，而是描述古今广泛发生的，人生中带普遍性的抽象情感，对众多类型的恨事与别愁进行排比与集合”。江淹“将辞赋描写的主体从具体的物象世界，转向抽象的情感世界，而且突破自我个体情感的特殊性局限，深入、拓展到一般性的，超越自我个体的抽象情感世界，开辟了辞赋对难以把握和体现的心理、情绪的探索和剖析……抒情赋至江淹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超越了自我个体局限的单一性而通向社会群体之无限的复杂性。这样，《恨》《别》二赋便与社会各类人物的情感体验发生通感，发生广泛的共鸣。这是江淹对辞赋艺术的突出贡献”。〔11〕〔P76-77〕显然，上述观点的提出正以许棐所作概括为依据，既然“《别赋》分陈八类离别之苦，《恨赋》缕述八种饮恨之悲”〔5〕〔P60〕那么江淹所写自然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物的恨、别之情，甚至可以说是“普遍的人类感情”。这样一种理解为《恨》、《别》二赋赢得了“创格”（许棐语）的美誉，同时也将作为创作个体的江淹本人独有的情感体验悬置起来。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自唐以后，拟作《恨赋》、《别赋》者代不乏人，其中甚至不乏像李白这样的旷世之才，但鲜有堪与江淹媲美者。钱钟书《管锥编》论及江淹《恨赋》时有云：“李白号‘仙才’、‘天才绝’，而所作《拟〈恨赋〉》，了无出语，未见飞仙绝迹，只似寿陵学步，唐临晋帖，尚不足言拟议以成变化也。”〔6〕〔P1412〕所以如此，并非才有高下，而毋宁说是缺少江淹那种刻骨铭心的创作体验所致。

以上解读虽觉疏阔，至少还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误读，而据江淹《自序》所言，认定《恨》、《别》二赋乃江淹“自娱”之作，进而质疑江淹创作的主要动机为“自申愁恨”，⑨则几同凿空之论，其与真相之隔又岂止“一尘”而已。至于称《恨》、《别》二赋的新颖之处在于排比铺叙同类典故，亦即所谓“类书化”写作，更是欲褒实贬，似为“江郎才尽”之说做一注脚也。

当然，指出江淹之作《恨赋》与其特有的经历、体验密切相关，并不意味着可以借此将前人之说一概否定。依美国当代文论家赫施（Eric Donald Hirsch）之见，所谓诠释的对象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的含义（Sinn），二是文本的意义（Bedeutung），前者是作者赋予的，恒定的，而后者则因读者而异，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⑩据此，对于江淹《恨赋》的解读也就可以有两种：一是侧重对文本含义的探求，如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二是侧重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即王夫之所言：“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两种解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无论作何种解读，均当如钱钟书所言，除了由文本入手领会作品之题旨之外，“须复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辞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

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sup>〔13〕</sup>(P171)

虽未能至，然心向往之。

[注释]

- ① 参看朱永嘉博文《关于生与死的思考(中)——重读江淹的〈别赋〉与〈恨赋〉》，文章网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e3afd90100srlz.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e3afd90100srlz.html)。
- ② 本文所引江淹作品皆据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再逐条出注。
- ③ 参看拙文《〈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 ④ 曹道衡先生《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文载《艺文志》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曾指出，李陵、冯衍和嵇康三人在江淹心目中，“都是有才能、有抱负而不被理解，‘名辱身冤’、‘赍志没地’的，所以引以自比。至于明妃之‘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也是以男女比君臣的常例，仍属自况之辞。特别是赋的后面讲到：‘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汨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更是他贬官吴兴时心情的写照。”曹先生看出《恨赋》所写李陵等四人均有江淹自况之意，堪称慧眼，可惜未能对江淹为何选此四人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若衡以江淹写作《恨赋》之用意，犹或有间。
- ⑤ 参看顾农《重读鲍照〈芜城赋〉》，《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4期。顾文特别引述清人汪中《广陵通典》所记，证实广陵之被称为“芜城”乃在沈庆之破城之后：“城陷之日，云雾晦冥，白虹临北门，巨属城内。自后广陵每风晨雨夜，有号哭之声，当时谓之芜城。”从《芜城赋》第二段所写景色及篇末“边风急兮城上寒”来看，鲍照登临广陵古城的时间当在冬季，故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大明三年或四年冬，若是前者，则距广陵城破、刘诞被杀不过半年左右，更易引发江淹的感慨。
- ⑥ 据《宋书·文九王传》，由冠军将军任农夫等率领的朝廷军队到达京口后，即“放火烧市邑”，这与元嘉二十七年文帝下旨“焚烧广陵城府船乘”(《宋书·索虏传》)、大明三年刘诞“焚烧郭邑”(《宋书·文五王传》)不乏相似。
- ⑦ 江淹《泣赋》云：“心蒙蒙兮恍惚，魂漫漫兮西东。咏河、充兮故俗，眷徐、杨之遗风。眷徐、杨兮阻关梁，咏河、充兮路未央。道尺折而寸断，魂一逝而九伤。”其中末两句《太平御览》卷四八八“泣”字下引作：“虑尺折而寸断，魂一逝而九伤。”两相比较，应该说《御览》所引于义为长，当是江赋原文。“虑尺折而寸断”正对应上文“心蒙蒙兮恍惚”，而“魂一逝而九伤”亦与屈原《九章·抽思》“魂一夕而九逝”、江淹《哀千里赋》“心一夜而九摧”相合。今本改

“虑”为“道”，亦“骨折心惊”之类也，岂江淹之本意哉！“虑”尚可“尺折而寸断”，则“心折骨惊”又何须以互文解之。

- ⑧ 如近人刘师培《文说·析字篇》道：“别有慧业才人，创造险语，鬼斧默运，奇句自矜，或颠倒以为奇，或割裂以示巧，由是‘坠心危涕’，文通互易其文。”今人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也说：“由于作者刻意求新，有时遣词有欠通处，如‘心折骨惊’一语，就颇为论者疵议。”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前言》认为：江淹集中不但章表之作“堆砌典故，雕琢词藻，一些诗赋也不例外。如《别赋》中‘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恨赋》中‘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就是刻意雕琢的著名例子。这些显然都是不足取法的。”
- ⑨ 参看邬国平《江淹为何写〈恨赋〉〈别赋〉》《文史知识》，2011年第7期。邬文写道：“从江淹用‘自娱’表白他写作的心迹来看，可以肯定仅仅从作者自申自述其愁恨的维度理解这两篇作品，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与作者写这两篇赋真实的、根本的缘起尚隔一尘。”
- ⑩ 参看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第16-17页及中译本前言，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参考文献]

- [1] (清)黄宗羲编.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 (清)陶元藻.泊鸥山房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41册.
- [3]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 (清)许梈.六朝文絮[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 [5] (清)孙梅.孙评《文选》[M].转引自何沛雄.慷慨激昂淋漓尽致——江淹《恨赋》赏析[J].名作欣赏,1987(5).
- [6]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7] 吴乾兑、刘修明.读江淹《别赋》《恨赋》——兼评南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J].社会科学,1979(2).
- [8]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1] 赵乃增.总制众善 博综杂变——略论江淹辞赋艺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1).
- [12] 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 [13]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